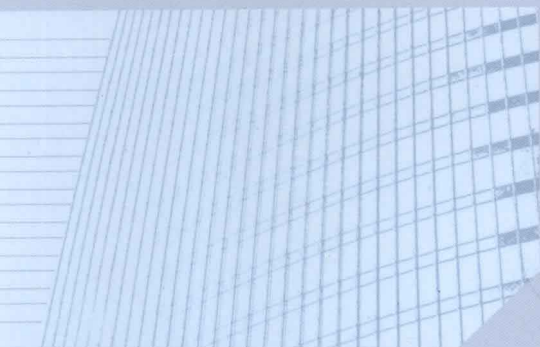




经济与管理 战略研究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1

2012

主 编 吕志胜

我国“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历史定位 刘尚希

宏观经济预期均衡的性质：近似理性预期理论 邱晨曦

关于外汇储备若干问题的思考 董艳玲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联国际业务策略
——基于混沌理论的分析 徐有轲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经济与管理 战略研究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1

2012

主 编 吕志胜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 2012 年. 第 1 期/吕志胜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41 - 2041 - 7

I. ①经… II. ①吕… III. ①经济管理 - 丛刊
IV. ①F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4223 号

责任编辑: 于 源
责任校对: 王凡娥
责任印制: 邱 天

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

主编 吕志胜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9.5 印张 180000 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041 - 7 定价: 21.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宏观经济与政策

我国“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历史定位	刘尚希 3
宏观经济预期均衡的性质：近似理性预期理论	邱晨曦 13
我国“二元经济”的经验分析与政策启示	李鸿飞 28
“两会”制度与“中国式”民主政治	郭海英 36

产业经济理论前沿

滨海新区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战略构想	董艳华 45
三种主要油料作物种植效率的非参数比较研究	王宪良 吕杰 57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张东胜 66

金融与贸易经济

关于外汇储备若干问题的思考	董艳玲 81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联国际业务策略 ——基于混沌理论的分析	徐有轲 92
我国民间融资风波的成因及影响分析	虞海侠 王达学 100

管理科学与管理战略

联想集团国际化战略的经营之道	朱凤存 潘苗 113
Ntada：一种网络流量异常检测算法	吕军晖 于龙洋 张瑾 128

宏观经济与政策

我国“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历史定位

刘尚希*

关键词

摘要

“十二五”
公共风险
发展方式

从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期,是终结过去三十年与开启未来三十年的一个接合期。“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发展背负着双重任务:终结过去三十年旧的发展方式、改革方式与开放方式,同时开创我国未来三十年新的发展方式、改革方式与开放方式。终结旧的,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而是因为旧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开创新的,意味着要承受巨大风险,但别无选择。我国的“十二五”充满着严峻的风险挑战,有双重风险等着我们:无论是终结旧的,还是开创新的,这本身都是巨大的风险。

由国家编制五年计划是从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1929年,当时的苏联政府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五年计划实施取得的巨大成功,作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一种工具,编制五年计划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我国受苏联的影响,1951年上半年即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1955年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取得巨大成就,自此一直编制五年计划。除了1963~1965年进行经济调整之外,五年计划的编制都未曾中断过。从“六五”计划(1981~1985年)开始把社会发展纳入到五年计划当中,五年计划变得更为全面。到“十一五”时把五年计划变成五年规划,“计划”改成“规划”,标志着计划经济的烙印进一步淡化,也表明国家对经济社会的中期管理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方向指导。

不同的五年规划都与当时的历史阶段、要求、任务、使命相吻合。现在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十二五”跟以往的五年相比,其承担的历史

* 刘尚希:(1964~),经济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公共理论与政策。

使命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五年——“十二五”，我们应怎么看待？与以往的五年究竟有何不同？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十二五”是中国处于转折时期的五年，这个五年将会打上浓厚的历史烙印。

一、从三十年的时间周期看“十二五”的历史定位

如何看清楚当前正在度过的“十二五”的历史定位？这关系到我国未来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从近代来看，尤其是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观察，三十年是个有趣的数字，带有某种周期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三十年都有一个大转折。从共产党成立（1921年）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即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大约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取得政权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大约又是三十年。1978年12月中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到2010年，按照GDP衡量，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恰是“十一五”结束之年，从“六五”到“十一五”，经历6个五年计划（规划）即30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实力、财政实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

从上面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到，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大约每隔三十年，我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历史性转折。也许是巧合，我国“十二五”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述，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那种方式，包括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的方式、开放的方式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国再次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处于这个历史节点上的“十二五”显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意味着一个旧三十年的终结，新三十年的开始。有人可能会疑惑，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怎么可以说会终结呢？难道不能沿着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吗？其实，这不是想不想终结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终结的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将不可持续，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会中断我国崛起复兴的进程。

终结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更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甩掉历史包袱，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通过不断探索，找到一条我们国家发展的新路子。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终结是开始的前提。

（一）发展方式的终结——从以GDP为纲的单一发展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转变

过去三十年形成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沿着旧的发展方式再继续走下去了。旧的发展方式是由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支撑的，是一种粗放的、

外部性非常大的发展方式。我们这三十年实际上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我们在工业化起步的时候，也知道西方国家走了这样的一条路，我们本想避免，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不由自主地还是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现在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迫使我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不得不加快转变。这不仅从国内看是如此，从全球看也是如此。13 亿人口的大国进入到全球工业化的行列，挤上全球工业文明的列车，给全球工业化格局、资源和环境都带来了深刻影响。现在全球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危机。即使我们愿意走老路，国际社会恐怕也不会答应。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旧的发展方式肯定无法延续下去了。

旧的发展方式不仅仅是遇到了资源、环境的约束，还遇到了全球市场的约束。我国长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也已经走不下去了。出口导向，靠外力支撑 GDP 增长，而内需不足，这样的发展方式很脆弱。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其脆弱性也随之扩大，即使没有外部的冲击，脆弱的经济迟早也会出问题，潜伏着经济危机。不仅如此，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利益矛盾冲突不断增多，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潜伏着社会危机。从整体来看，这意味着潜伏着国家危机。

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显然，这个转变，要在“十二五”的这五年中充分体现出来，也就是在“十二五”期间要终结这种旧的发展方式，终结以 GDP 为纲的单一发展，要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改革方式的终结——从“问题导向”向“风险导向”的改革方式转变

传统的改革方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要推动改革比过去难得多。过去改革的共识是全面形成，改革的动力很强，那个时候改革相对容易。现在的改革有人说已经到了“深水区”，越来越难，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改革都很艰难。从这些年来看，我国改革整体进展不大，甚至还有停滞的现象，所以引起社会多方面的批评。那么传统的改革方式又是什么呢？也许大家可能想到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是中国的特色。其实，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改革长期以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风险导向。问题导向，是问题推动改革。也是就说，有了问题摆在面上，甚至变得相当严重了，然后再去改革，想办法去解决。这是事后的方式，等到问题出来了再去解决实际上已经晚了，是被迫改革，也是被动改革。现在问题越来越多，采取这种问题导向的改革方式，有一事解决一事，已经行不通了。

怎么办？那就是要转变为一种新的改革方式——风险导向。风险是一种可能性，风险意味着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我们用风险思维，或者说用风险理性去感知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风险意识。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要出问题的地方，包括体制、机制和管理；经

济、社会和政府，并对其进行改革。改革要具有前瞻性，而不是马后炮，等到问题成堆了再去改，这样改起来很难，成本也很大。在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仅仅是有个苗头时我们就去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显然成本小，而且可以系统设计，在总揽改革全局的条件下，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这是一种主动式的改革、前瞻式的改革。

当然，这也有难题，没有一个大的问题甚至危机摆在那，改革共识难以形成。也许有人要说，没有问题改什么革？从历史来看，有时候往往需要危机来推动改革，社会领域的一些改革尤其如此。例如，长期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是因为2003年出了“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站被人打死了，他的死亡直接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再像2003年“非典”，直接暴露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长期积累的问题，从此以后开始重视医药卫生领域的改革。这些都是等到出现严重问题，出现危机的时候才去改革。但此时已经造成了很多危害。所以，传统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甚至以危机为导向的改革方式已经不行了。

在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在网络相当发达的今天，进入了信息社会，面临的问题跟过去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它会被放大、叠加、链接和混淆（例子：郭美美事件、假的税务总局四十七号文件）。现在的信息社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问题很容易被扭曲放大。如果以扭曲的问题来推动改革往往也收不到好的效果，甚至得不到社会的拥护。特别是现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在减弱。尤其是像强制拆迁、儿童血铅超标、毒胶囊等接二连三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以及各种各样的腐败，在一点点地蚕食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一些改革举措，老百姓都会表示质疑，哪怕政府的动机、出发点非常好，老百姓都要打问号，这样一来，改革很难推动，往往会导致问题一点一点地累积起来。例如，针对政府提出要改善宏观调控这样过去很少被质疑的问题，网民也在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是在用行政权力干扰市场，社会对这种宏观调控不认可。也许是政府对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但是老百姓意识到了。老百姓认为是在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在寻租，是在限制老百姓自己去改善民生，认为市场就是最大的民生。这种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反映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社会对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再像以前那么认同了，甚至认为政府这种宏观调控是在帮倒忙。这就需要反思，宏观调控的问题出在哪？那就不能等到问题成堆了再去改革，更不能等惹出了大麻烦才去改革。

因此，改革的思维需要调整，改革的方式也需要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终结传统的改革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这恰恰是“十二五”需要做的，是我们未来五年需要做的。“十二五”要终结旧的改革方式，逐渐形成新的改革方式。

（三）开放方式的终结——从“数量导向”向“质量导向”的开放方式转变

过去长期以来，对外开放是数量导向，而不是质量导向。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从数量导向的开放方式转变为质量导向型的开放方式。长期来，我们对开放的理解较为简单，就是打开大门，把市场让出来，让外面的产品、资金也就是投资进来，再把产品卖出去，就算开放了。这种开放观，现在看起来确实存在问题，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一方面大肆引进外资，代价不菲，各级政府都以引进外资多少作为衡量开放的政绩；另一方面，我们把大量的钱很廉价地借给发达国家使用，从整体算大账，我国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家，是付出得多而赚回来得少。发展中国家借钱给发达国家使用，这从经济学上是讲不通的。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说明我们这样的开放是没有质量的，至少是质量偏低的。从国内区域来看，也有这样的表现。经常去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调研，发现欠发达地区当地的资金大量流出去了，但当地政府却在大力招商引资。一方面，本地的资金没有充分利用，闲置或流走了；另一方面，又花很大的力气、很高的代价到外地去引资，这也是一种怪现象。这种开放只是两眼看着外面，而没有看到这种开放方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样的开放方式，变成了为开放而开放，为了政绩而开放。如果开放不能提升我们的能力，而仅仅把外面的资金、资本、企业、更大的跨国公司引进来，那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质量的。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我们每天都在吃各种认为好的东西，但若不符合身体的需要，盲目地吃；或不管能否消化吸收，只是为吃而吃，我们的身体素质也不会因此而增强，甚至因此而得病，身体会越来越弱。经济社会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发展也是一个道理。在起步的时候，缺少资金，引进外资是必须的。在使用资金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引进一些企业来，也是必要的。但长期这样做，只是引进，把开放本身当成目的，而忽略自身发展能力、创新能力的增强是没有出路的。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就一个地区而言，会陷入恶性循环：自身能力弱—借助外力发展—自身能力弱化—更加依赖外力。例如，我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外资企业完成的，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中多数也是外资企业生产的，给国家增加了GDP，但国家的产业、产品的竞争力长期难以提高，国民财富并未与GDP同步增长，同时还付出了大量资源、环境的代价。所以，这样的开放方式需要终结了，实际上现在也已经搞不下去了。“十二五”的五年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终结这种旧的开放方式，要迎来新的、更高质量的、促进能力提升的新的开放方式。

二、“十二五”将要承受重大风险挑战

上述三个终结意味着“十二五”这个五年不同于往常的五年，对于未来

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能否起好步的五年。终结旧的，同时意味着开创新的，即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形成新的改革方式、形成新的开放方式。毫无疑问，对“十二五”来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而艰巨。“十二五”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五年，是关键五年。在这个五年里，若是能完成上述任务，将会迎来未来三十年的良好发展；若是没有做到，依然在旧的轨道上滑行，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将可能一蹶不振。显而易见，“十二五”承受着巨大的风险，终结旧的，开创新的，这本身就充满着风险。

（一）内生的公共风险

“十二五”面临很多挑战，从国内来看，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1. 经济转轨没有完成

尽管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整和健全，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更谈不上体现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因此，我国的经济转轨并没有完成。

市场体系不完整，尤其是要素市场，如技术市场、金融市场、资源性产品市场等，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素的流动、价格的形成、交易的搜寻等处于深度抑制状态。市场经济的规范也不完善，无论是隐性的市场行规，还是显性的市场法治，都还在发育之中。市场歧视依然突出，比如说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玻璃门”的现象，看得见进不去，投资、融资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自身的原因。金融存在同样的问题，金融歧视更为严重，我国中小企融资困难就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市场垄断难以打破，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相互叠加在一起，妨碍市场竞争。整体看，市场抑制表现为现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方面都表明我国经济转轨没有完成，市场机制的功能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效率释放在边际递减，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不仅如此，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的距离，与共同富裕这个本质要求似乎在背道而驰。如果陷入两极分化，即使市场机制有了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那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工具或手段，应当服从于社会主义的要求，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可能就像吴敬琏所说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如果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递减；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恶化，两者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公共风险将会出现“ $1+1>2$ ”的放大效应。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2. 社会转型刚刚开始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社会改革。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社会体制，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过去三十多年并没有多大的调整，更谈不上改革。这涉及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一直到现在，政府“包办”社会的体制没有变化，除了市

场，就是政府在发挥作用，作为与市场力量并存的社会力量基本上不存在。这既与中产阶层弱小有关，更与政府对社会放权不够有更紧密的联系。

建立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同时形成“政府—社会”互动、“市场—社会”互动的共同治理新格局，将是社会改革的基本任务。与经济改革相类似，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增强社会的自治功能，使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通过社会的自治功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自我消解，避免因超出政府能力而导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过度紧张。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只是关涉贫富差距的大小，更与社会的治理结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便需要社会改革来推进。

社会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重塑社会主体，例如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就是改变完全由政府“包办”社会事业的状况，塑造新的社会主体。鼓励各类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也是社会改革的内容。较之于市场发育，社会发育同样重要。前者培育的是市场理性，即经济理性；而后者培育的是社会理性，即公共理性。这两者对于一个健康社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从整体看，我国的经济理性发育超前，而社会理性却严重滞后，这将导致严重的公共风险：社会凝聚力下降，规则意识难以形成，社会失序失稳。因此，社会改革需要在“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并应摆在这个时期各项改革的首位。

3. 政治转型还有待启动

政治转型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实现有机统一，这是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党的领导下怎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难题，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是有限的，有的政策并没有考虑法律，甚至是在与法律冲突的条件下红头文件就发出来了，法律的意识还不强。现在有一种现象，国家的治理包括经济的治理、社会的治理，很多时候是首先看领导讲话，靠领导人批示，而红头文件、黑头文件（法律法规）的作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现实的情况通常是领导讲话摆在第一位，红头文件摆在第二位，黑头文件摆在第三位。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意识仍相当薄弱。那我们怎么样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怎么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真正地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着向前走，不能故步自封，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需要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推进。否则，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难有进展。

（二）外生的公共风险

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美元陷阱、全球化陷阱。我国人均 GDP 已过 4000 美元，按照国际上现有的划分标准，我国刚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而人均 GDP 却排在全球的 100 位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当说是一件好事，但从国际社会来看，

可能会出现一种发展停滞的现象，拉美国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国家发展失去动力。巴西人均 GDP 曾经一度超过 4000 美元，之后有一段时间却反而倒退了，从人均 4000 多美元降到 3000 多美元。学界把这种国际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到了这个“坎”上，能不能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水平达到高等收入水平，从人均 4000 美元向 1 万美元挺进，其风险是巨大的。因为我国向高收入水平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外部阻力。就像飞行器的飞行，飞得越快，其外部阻力也就同时增加，必须有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完善的结构体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美元陷阱”，这是指对美元虚拟资产的依赖而又无力摆脱的一种状况。如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不得不购买美元虚拟资产，这些资产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掌控在别人手中。自 2001 年以来，美元贬值已经超过 40%，随着时间推移，巨额美元资产的经济价值可能会丧失殆尽。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同时又是美国的主权货币，其发行权掌控在美国手中，美元资产实际上也掌控在美国之手，大量国民财富是否安全依赖于美国的“良心”。

还有“全球化陷阱”，这是指市场、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有可能被锁定，并被国际金融资本所控制的一种可能状态。我国 200 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开采等行业产能占世界一半。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名副其实，但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从全球分工来看，与其说是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车间”，或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尽管我们知道受上下游的盘剥和挤压，创造的很多财富被他国转移了，巨额成本由我国承担，但我国又被拴在全球价值链条之上，一时还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诸如此类，这些正是在“十二五”期间遇到的，在之前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们没达到中等收入，谈不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对美元的依赖也不严重，全球化也不像现在这么深、这么广。而到今天，这些问题都叠加到了一起，同时遇到了。那么，我们能否跨过这些“陷阱”呢？关键在于“十二五”期间的改革创新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从时间维度来看，“十二五”是我国的一个大“坎”，风险非常大，也可以说是一个生死关头。在这五年，如果我们能顺利地度过，能完成预定目标，那么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就能持续下去，强国富民之梦就有实现希望。如果这个“坎”迈不过去，国家发展就会停滞，中华民族的复兴可能就此夭折。“十二五”是决定未来命运的五年，只有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加快终结旧的发展方式、旧的改革方式和旧的开放方式，国家发展才能突破瓶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结 论

“十二五”是我国关键的五年，是承上启下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五年背负着双重任务，既要终结旧的，又要开创新的。可见，这个“十二五”不是一个平常的五年，不是一个简单数字概念上的五年。

更重要的是，2012年我国要召开十八大，新旧领导班子从上到下进行交接，这也是个大事，刚好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十二五”期间。所以，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来看，“十二五”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五年，是一个转折性的五年，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至关重要的五年。

就此而论，我国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下一步怎么走，没有人告诉我们，要靠自己探索。把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道路找到了，那么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就大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但这不是必然的，其中会有波折，现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甚至包括政治层面的矛盾都汇集到了一起，这需要大智慧去解决这些历史性的大课题。世界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相信“十二五”这一历史关口一定能闯过去，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但是，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尤其是要从实际出发，在思想上、制度上、科技上不断创新，既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抄照搬国外的，也不能沿着过去的方式、顺着过去的惯性、循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了。

对一个国家来说，思想的创新是最重要的。没有思想的创新，很难有制度的创新；而若没有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面向产业、市场的科技创新，往往以制度创新为前提。因此，鼓励思想创新，并为之提供条件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让创新的思想引领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是我们应对严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

参 考 文 献

[1] 管汉晖、林智贤：《“五年计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载《中国经济》2011年第4期。

[2] 刘尚希：《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欧文汉：《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府职能完善》，载《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2011年第1期。

[4] 苏明：《当前的财政形势和“十二五”政策取向》，载《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2011年第1期。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Shangxi Li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ime span of three decades,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There are significant tasks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developing will be ended, followed by implementing new approach. The end of the traditional way does not mean denying the past. In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risks that we will not expect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 words: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ublic risk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宏观经济预期均衡的性质： 近似理性预期理论

邱晨曦*

关键词

摘要

理性预期
近似理性预期
声誉
一般均衡分析

将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声誉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本文的创新。笔者把声誉视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为整个经济体提供的一种状态，企业和家庭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最大化决策。如果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声誉足够高，宏观经济稳定，近似理性预期均衡实现；反之，宏观经济波动剧烈，理性预期均衡实现。本文的结论是：经济危机是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诚信危机，解决危机也应从恢复诚信入手。

一、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决策都会涉及对未来不确定结果的预期。第一个使预期在经济分析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经济学家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通论》中，他强调了长期预期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他的核心思想背离古典模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凯恩斯并没有给出分析预期的明确方法。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公众是愚昧的，易于波动的从众心理是形成预期的主要原因，从而否定了预期形成的客观基础。

蛛网模型是最早用于分析预期的方法，它说明了生产计划的形成与实现之间存在延迟。由于它的假设条件比较严格，因而多用于分析农产品市场。但是该模型忽略了企业在学习能力，认为它们只能是一错到底。因而得不到经验的验证。

为了克服蛛网模型的缺点，梅茨勒（1941）提出了外推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对未来的预期不仅要以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为基础，而且要建立在经济变量的变化方向上。单就数学形式看，外推性预期理论用二阶差分方程代替了蛛网模型的一阶线性差分方程，因而动态特征更明显。但是外推性

* 邱晨曦：（1977～），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银行总行；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理论、经济计量学、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研究。